

日前，“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在广东省博物馆开展，以文物与制度演进的双线叙事呈现广东千年对外贸易史。本期羊城晚报文史哲周刊以此为契机，约请李岩、张强禄、李灶新等学者，借助“南海I号”“南澳I号”沉船及白马窑群等考古发现，梳理宋至明广东海上贸易管理制度的演进脉络。器物与遗址为载体，制度的弹性演进贯穿其间；后者不仅塑造了贸易秩序，也体现了广东在开放、包容与互利精神中的历史智慧。本版由此呈现制度在江海之间运作的实证图景，以及其对经济与文化交流的深远影响。

专题策划：温建敏  
专题执行：潘玮倩

□ 李岩

所谓“古代全球化”，主要指以海上丝绸之路为核心的跨区域交流体系，自汉代延续至地理大发现前。本文聚焦海路，涵盖环中国海与印度洋两大区域。西方《厄立特里亚海周航记》(1世纪)与中国《汉书·地理志》均描绘了早期海贸格局。

“南海I号”是一艘南宋时期远洋商船，1987年在广东下川岛海域发现，其较完好船体与货物为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对它的发掘和研究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里程碑。本文从发掘出发，剖析船货构成，探讨技术与文化双驱动力，呈现“古代全球化”的实证与当代启示。

# “古代全球化”的实证与启示 从“南海I号”看“货通万国”



「南海I号」发掘之初 作者供图

货船管理制度，为宋代海上贸易的规范化与制度化找到实证。

## 船货档案：千年前全球化的商品与网络

现存日本文献中的《李充公凭》——北宋崇宁四年(1105)颁发的“出海官方许可证”，详载船员构成及所携货物与课税，呈现了宋代市舶管理制度，为“南海I号”提供了相应参照。

作为“全球化”意义的实证核心，“南海I号”船货可分三大类：大众商品、高档奢侈品与国际支付工具，对应不同消费市场，继而映射出贸易活动背后的社会等级。

### (1) 船货结构的分层——从大众商品到奢侈品

大众商品以瓷器和铁器为主。瓷器约16万件(套)，覆盖景德镇薄胎瓷、龙泉青瓷、德化瓷、闽南磁灶窑、耀州窑等多窑系，分布于多个船舱，部分有墨书。铁器出水百余吨，属海外市场“刚需”，与《岛夷志略》所记多地购中国铁器吻合。

高档奢侈品有漆器、铜镜等制作精良、兼具实用性及礼仪性的器物，多集中存放，反映身份与财富。

作为国际支付工具的贵金属尤为关键：包括300余千克的白银(银铤)(宋一两约40克，此间常见25两规格)，用于大宗采购；轻薄易携的金叶子(重约一两)。另有两万枚铜钱及融合伊斯兰与当时中国风格的金项链等饰品。这些

高价值物部分集中于“舟舫”，体现了对金融资产的严格管控。

### (2) 社会结构——船货归属与船员生活

船货归属清晰对应乘员等级：铁器、金银货币等高价值物应属纲首、知客等高层；量大价低的瓷器多为中小商人所有。汉语墨书与佛教用品等表明船员主体为中国人；个别大金链子等具浓厚异域风格的珠宝则提示有外商参与航行。海粮包括咸鸭蛋、家鹅(有鸭笼出水)、槟榔果核与稻谷壳等。淡水极珍贵，南朝法显记述的严控用水与后世“封船”制度相互印证。这些发现连同出水的斗笠等日常用品，显示航海生活艰苦且管理严格。值得注意的是仿制西亚风格的黄金制品，体现了跨文化交流的再创造。

整体上，“南海I号”以凝固的物证呈现出等级分明、商旅成分多元、管理制度严密、具有文化融合能力的宋代海上贸易社会图景。

### (3) 贸易网络的复原——接力式航线的全球足迹

综合货源与集散路线，“南海I号”的航行具有典型的分段集货“梯航”模式。其始自杭州，装盛金叶子、银铤等“本金”及湖州“石家”铜镜等(实用器具与外贸货)；至明州(宁波)汇入景德镇等地瓷器，宁波大榭仓储遗址出土同类瓷片可以为证；再至泉州增城铁器等大宗货；最终在广州补给咸鸭蛋、“广东罐”(低度酒等生活物资，并经市舶司勘验取得出海“公凭”)。

仿西亚风格金器、项链及用于贵金属称量的天平衡器、砝码，指示其目的地

为环印度洋伊斯兰商贸易圈。船上二十五两标准银铤与文献所述采购“苏吉丹”(今印尼爪哇东部)胡椒的支付手段相符；川芎等药材亦循此路出口。

宋代全球化贸易体系的结构——硬实力(产品、技术)与软实力(制度、文化)——在此船中得到充分体现。

## 体系驱动：宋代全球化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宋代海洋贸易的鼎盛并非偶然。“南海I号”显示其成功是依赖于一套强大体系“技术→商品→金融→文化”的环环相扣。

(1)硬实力：构筑技术“护城河”。宋代在关键领域的压倒性技术优势是其主导海上贸易的根本。

航海与造船：远洋航行依赖可靠工具。“南海I号”采用水密隔舱设计，提高了抗沉性；硬质风帆与成熟舵系保证了复杂海况下的操控；指南针广泛用于“火长”导航，使远洋航行从经验摸索转向科学掌控。

制造业领先：以瓷器为典型。宋代窑址遍布东南，产业高度专业化、规模化，品质与产量独步全球。欧洲直至18世纪初德国迈森才通过逆向工程破解硬质瓷烧制奥秘。可见宋代优质瓷器是硬实力的全球顶级品牌，它们形成难以逾越的“制造业护城河”，领先世界六百余年。

(2)软实力：制度与文化的协同输出。

如果说技术是引擎，那么精密的制度设计与深层文化吸引力就是润滑剂与导航仪。

国家制度与务实管控：宋代建立了中央到地方的市舶管理体系。从广州首设市舶司到颁布《广州市舶条》，海外贸易纳入国家规范，“公凭”许可与船员“甲保”连坐等制度体现了精细化管理。高层关注贸易秩序，如宋高宗曾亲自过问蒲亚里案，显示出国家与民间合力推动的格局。

金融与风险控制：贸易催生先进金融工具。银铤、金叶子等贵金属构成国

际硬通货；同船出水的杆秤与等臂天平(在我国首次出土)及砝码等，无声宣告当时一些区域贸易的“度量衡”之中国地位。面对远洋贸易高风险，商人发展出合资模式分摊风险，南宋秦九韶《数书九章》中记载的海商合伙投资香料之算题，即为明证。

文化渗透与创新：贸易的终极输出是文化与生活方式。宋代瓷器以典雅造型、温润釉色向世界传递中国独特审美；船上出水的融合异域风格的戒指半成品，显示工匠主动吸收并创新外来文化。宋代全球化模式因此兼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

综上，“南海I号”证明了宋代的海上优势是一种系统性的胜利：凭技术领先、制度保障、金融创新与文化感召，创造了公平互惠、连接世界的可持续贸易模式，这为后世留下深远启示。

## 历史启示：从千年全球化到文明基石

“南海I号”显示出了真正的“全球化”是始于技术领先、成于商业共赢、久于文明互鉴。宋代以“技术→商品→金融→文化”驱动此全球化；领先的造船与制瓷技术构建贸易基石，接力的航线推动规模的扩张，金融工具与合资模式保障信用与安全，器物承载审美与生活方式，最终实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这一模式以民间商贸为主导，以互利共赢为原则，为跨文明交流提供了可持续范本，极大区别于后世一些国家的殖民掠夺。如果我们把史前的农业革命视为人类文明的一次奠基，那么，中国宋代制造业与航海的系统性突破，可被视作早期全球化的一次重要“产业变革”。

今天，我们研究“南海I号”，昭示的不仅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辉煌，更是文明演进的规律：每一次重大进步，本质上都是知识、技术与制度在开放交流中迭代的结果。历史从未断绝，智慧照亮前程。

(作者李岩是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员，曾参与“南海I号”整体打捞工程)

2025年12月12日

星期五

责编 潘玮倩

美编 张江

校对 马曼婷



“南海I号”上的印花陶罐

# 考古发现探究宋明广东海贸制度的演变

□ 张强禄 李灶新

要看清广东千年来作为“排头兵、先行地”的海外贸易制度底色，可从那些埋于土中、沉于海底的考古遗存入手。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使我们得以直接接触及过往千年的历史场景。近年来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尤其是水下沉船遗址与陆地窑口、港口遗址、中心城市等的联动研究，能够比较清晰地勾勒出宋至明时期广东海外贸易管理制度演进的若干实证证据链。

## 考古实证：解读广东外贸史的一把钥匙

广东的对外交流源远流，秦汉即见规模。汉武帝平南越后，将岭南纳入一统格局，官方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番禺(今广州)、徐闻、合浦为要港，航线远达中南半岛、印度东南海岸与斯里兰卡。南越国官署遗址、南越文王墓与广州汉墓等出土的异域器物，是早期海贸的实证。

唐宋间此线索更见分明。唐代广州为东方第一大港，也是全国唯一由市舶使与大都督、节度使共理海外贸易的港口城市。《广州通海夷道》记述自广州出发可抵西亚、东非，历30余个国家和地区；《唐故杨府君神道之碑》、《南海神广利王庙碑》与印尼“黑石号”沉船出水文物等，无不彰显开放包容、通达四海的大唐气象。

五代十国时期，爪哇海域的印坦沉船仅见五代南汉“乾亨重宝”铅钱等，与南汉康陵出土异域风格的玻璃器相互印证，说明其时仍维系通向东南亚的海贸网络。参照文献所载南汉沿袭唐“押蕃舶使”制度，可释黄巢之乱后广州港为何迅速恢复。正因南汉留下成熟体系，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入主岭南，在广州设全国首个市舶司时，几乎可以无缝衔接既有制度。此后广州长期居全国海贸枢纽；虽明代海禁趋严，仅许朝贡贸易，但东南沿海的私商网络始终不断。

清初学者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提到，“广东之地介于岭、海间。北负

雄、韶，足以临吴、楚；东临潮、惠，可以制闽、粤；西固高、廉，扼交、邑之喉；南环琼岛，控黎夷之门户。广州一郡，屹为中枢，山川绵邈，环拱千里，足为都会矣。”其更多的是从陆地的视角审视广东、广州。“不过，如果我们从海洋的角度、从海洋与陆地连接的角度去看，广州就是一个中心。”(刘志伟《广州三重奏》)

正是基于上述诸多与海洋、海外贸易相关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在更广阔的视野下尝试构建从宋元到明清的广东海贸“制度实践史”，梳理在国家意志主导、地方利益与市场规律共同作用下，广东千年来外贸制度所呈现的弹性演进。

## 宋代：“南海I号”揭示的制度规范和物流链

近年学界基本形成了“南海I号”来过广州”的共识。船上大部分酱釉罐与佛山南海窑、文头岭窑出土标本在胎质、釉色及戳印等方面高度一致，这些罐器与广州南越国官署遗址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遗址出土的带“大观三年”“酒境”“百花春”等戳印的酱釉罐也高度一致。由此推测“南海I号”可能最后从广州港离岸启航。部分酱釉罐检测出与酒相关的真菌等，表明它们原贮盛有酒。从酱釉罐印文可辨识，这些酒既有广州公使酒库生产的公使酒，也有私人酿酒作坊生产的私酒。

而在南海诸窑中，不仅出土与广州官方机构“宋代公使酒库”高度一致的罐器，还发现大量与宋代广州州衙建筑基址出土一样的板瓦、筒瓦、团花纹瓦当等建筑材料。从《大德南海志》记载文头岭窑附近早在元代已出现“官窑站”“官窑铺”“官窑驿”等地名，结合南越国官署遗址发现的宋代“官”字款酱釉罐、“三城窑务烧造到瓦官立”文字板瓦，我们有理由相信，宋代广州官府曾在南海诸窑设置窑务官，监督烧制官府所需建筑材料及贮藏公使酒的酱釉罐等日用陶瓷器。

由此，一条官方管控物流链或得以

复原：强烈暗示器物生产遵循某种官方标准或定向需求—器物运抵广州“公使酒库”装盛官酒或特许商品—器物被装载上“南海I号”这类或持“公凭”(许可证)的合法商船出口海外。

宋朝为增收实行严厉榷酒制度，酒、曲由官府专营专卖，岭南因“烟瘴不禁”，准许民间私酿“万户酒”。部分官员趁机违规售卖公使酒获利。且因免税，岭南之酒远比其他榷酒地区官方专卖官酒价格要低。“南海I号”来广州采购公使酒与私酒，即为运往东南亚获取巨额利润。

这一物质链条还体现了北宋以来海贸管理的制度化与规范化。因陆上丝绸之路受阻，宋朝依赖海上贸易。宋在广州设首个市舶司，负责对海商货物征税和专卖，并热情迎送海商，以吸引更多商人。外商或归航中国船舶入境时，巡检司登船检查、送酒食“并防护赴广州”；船舶停泊广州港内港期间，市舶司官员检查货物并设“阅货室”，秋冬十月返航更安排筵宴饯行。此礼仪后来推广至泉州、杭州等市舶司。

元丰三年(1080年)颁布的《广州市舶条》是已知最早的成文海贸法。“南海I号”船货中除陶瓷、铁器外，还有铭金叶子等贵金属；船舱货物分舱堆放，显示长期制度约束下的操作惯例，也提示宋代贸易已存在制度化安排。

## 明代之变：白马窑、深海沉船与“双轨”贸易

元代承袭宋制，至元三十年(1293年)颁布《市舶则法》，长期保留广州、泉州、庆元三司，形成较为系统的海贸管理机制。福建漳浦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1.6万余件龙泉青瓷，显示出高度专业化的生产与贸易网络。国家统一不仅保障龙泉青瓷在国内及海外流通，也推动官营与民营贸易并行，为明代海禁下广东沿海陶瓷产业的调整及仿龙泉生产提供历史背景，并为白马窑的兴起奠定基

础。

明初施行海禁，民间船舶禁止远航，海外贸易集中于官方朝贡体系。但广东作为朝贡贸易体系中的主要窗口和产品输出地的龙头地位依旧不可撼动。《明世宗实录·卷一八八》有载：“广东地控夷邦，而暹罗、占城、琉球、爪哇、渤泥五国贡献，道经东莞，我祖宗立法，来有定期，舟有定数，比对符验相同，乃为伴送附搭货物，官给钞买，载在《祖训》，可考也。”

宋元以来以龙泉青瓷为代表的外销渠道虽受阻，但海外需求依旧旺盛。在官方供给受限与市场需求高涨的张力下，明代广东沿海陶瓷产业实现面向外销的适应性变革，以白马窑为代表的仿龙泉青瓷生产体系应运而生。白马窑规模宏大，产品标准化、订单化，兼顾内销与外销，与广东其他窑场形成区域性生产网络，确保产量与品质稳定。近期南汉二陵博物馆举办的“翠色千帆——惠州白马窑与明代广东海外贸易”展览，就系统呈现了这一变革的核心实证。

在这一生产体系中，牙商或发挥关键作用，将产品与海外需求对接，体现了明代民间贸易在特定制度与地理空间下的活力，也为清代广州“十三行”体制提供历史经验。中后期广州—澳门—双港口格局为外销提供制度与物流支撑，使合法朝贡与民间贸易交织的“双轨”格局得以形成。

近年来水下考古揭示了明代中后期海上贸易的面貌。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约1500米深，正德年间1506—1521年)出水的青釉“福”字纹碗、模印人物碗等，显示福建、广东等仿烧龙泉风格青瓷的可能性，这将窑址(龙泉窑、余里窑、白马窑)、广州港与海贸路线串联，显示广东仿龙泉青瓷或经广州港进入海外市场。

汕头南澳海域的“南澳I号”沉船更呈现明代贸易的规模与专业化。出水文物逾万件，其中瓷器占94.5%，以漳州窑青花为主，兼有五彩、青白釉及景德镇产品；大量铜钱与铜料显示其为万历年间私人商船。

这一专业化、规模化的贸易模式与

“广中事例”所体现的管理思路契合。明代中后期，广东率先进行制度调整。“广中事例”是时人对广东一系列相关改革的统称，如复元宋元抽分制、万历年改为支抽，允许葡萄牙人租居澳门，并允许外国人与民众定期贸易。广州—澳门及南海沿线形成“双轨”航线与货物组合，使商船在许可或默许下运营，呈现出官方管控与民间活力交织的制度弹性。

目前，“南海I号”“南澳I号”及相关水下考古成果正在广东省博物馆“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展览，以及南越王博物院“看见岭南——广东省‘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成果展”中重点展示。

## 观察：考古视角下的制度演进脉络

梳理宋至明的关键考古发现，一条广东海上贸易制度的实物脉络渐次呈现：“南海I号”与“广东罐”揭示宋代《广州市舶条》等的制度化管理与物质形态；圣杯屿沉船的龙泉青瓷见证元代外贸网络的拓展；白马窑群则产生诠释明代海禁下，民间以技术迁移与产业重组构建替代供应链的生命力；“南澳I号”的丰富货品，折射出明中后期务实主义管理与更包容的官民共营秩序。

广东的千年外贸史，是一部制度“应然”设计与地方“实然”实践不断碰撞、调适的历史。文献描绘蓝图，考古器物与遗址则显现制度在江海之间的真实运作。广州及广东能成为千年贸易枢纽，关键也在于制度的务实精神与应变弹性。从唐市舶使、宋市舶司，到明“广中事例”，乃至清粤海关与十三行，管理形态虽因时而变，但内核里的那种于朝堂律令与市场动力之间不断寻找动态平衡的智慧，一以贯之。这，正是这段跨越千年的江海征程，留给我们的最宝贵启示。

(作者张强禄是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作者李灶新是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

